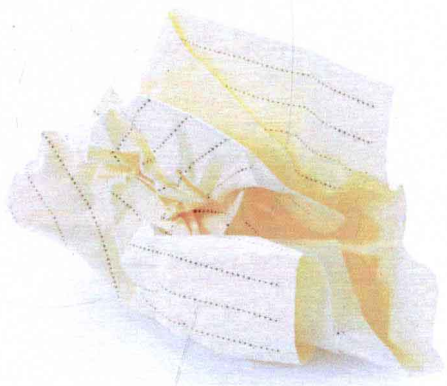




一是探索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内在渊源，尤其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二是从史料学的视角，探讨鲁迅早期以“立人”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形成的内在心理原因与外在社会因素……

新文学 的叩问与反思

孙拥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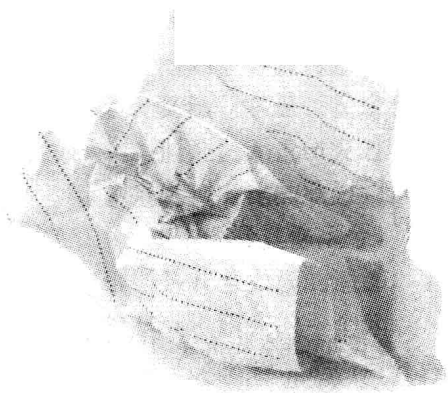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XINWENXUE
DE
KOUWEN YU FANSI

新文学 的叩问与反思

孙拥军◎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喻 震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的叩问与反思 / 孙拥军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14-6287-4

I. ①新… II. ①孙… III. ①新文学(五四)—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2788 号



书名 新文学的叩问与反思

著 者 孙拥军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287-4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6.6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重点对百年中国新文学史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了学术性研究。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索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内在渊源，尤其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二是从史料学的视角出发，探讨鲁迅早期以“立人”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形成的内在心理原因与外在社会因素，以及鲁迅与《河南》杂志的渊源、鲁迅创办《新生》杂志的一些问题考究和鲁迅小说中的女性观等；三是对刘庆邦、柔石、朱自清、巴金、陈忠实、李宽定、赵卫峰等百年新文学不同时期的作家及作品进行了反思性的研究；四是对中国新诗发展到 1958 年的思索，探究了中国新民歌运动对其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揭示出荒诞掩盖下的诗歌创作的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相。

目 录

第一章 不尽的叩问：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1)
第二章 鲁迅：启蒙与拯救时代的思想者·····	(21)
第一节 鲁迅与国民性批判·····	(21)
第二节 鲁迅与张天翼·····	(29)
第三节 鲁迅与陈映真·····	(36)
第四节 鲁迅和《河南》杂志·····	(45)
第五节 鲁迅和《新生》杂志·····	(55)
第六节 鲁迅与“五四”启蒙·····	(63)
第七节 鲁迅与乡土女性·····	(67)
第八节 鲁迅与东京外国语学校·····	(72)
第三章 刘庆邦：执著与坚守的乡土守成者·····	(77)
第一节 “乡下人”：乡愁里的生活乐章·····	(78)
第二节 “走窑汉”：炼狱里的生命史诗·····	(86)
第三节 创作取向：与时俱进与坚守执著·····	(94)
第四章 新民歌：荒诞掩盖下的真实·····	(99)
第一节 农民皆诗人·····	(100)



第二节	农民皆诗人的质疑·····	(108)
第三节	真正的新民歌作者·····	(114)
第四节	新民歌与中国新诗·····	(139)
第五章	碎言呓语：新文学的反思与追问·····	(148)
第一节	柔石：典妻视角下的国民性现代阐释·····	(148)
第二节	朱自清：《背影》思想内涵新时期解读史·····	(156)
第三节	巴金：《寒夜》解读的新视角·····	(165)
第四节	陈忠实：《康家小院》的国民性批判视角·····	(171)
第五节	李宽定：“寂寞”人生中的文学乡土世界·····	(181)
第六节	赵卫峰：游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诗者·····	(190)
参考文献 ·····		(199)
后 记 ·····		(204)

第一章 不尽的叩问：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主要表现在新文学，尤其是新文学肇始的“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还是在科学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合理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然后进行超越，创造新文化。

—

“五四”新文化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带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催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并且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准备期后才出现的。“五四”新文化诞生前的酝酿期，应是在中国晚清时代，它为“五四”新文化的出现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晚清时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对“五四”新文化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闭的门户，“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打击，野蛮的、闭关自



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①。自此，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闭状态和封建秩序被打破，中国社会在经济性质、阶级结构、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临着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岌岌可危的局面。为挽救民族危亡，魏源、林则徐、徐寿、郑观应、王韬、严复、薛福成等中国最早的一批思想改良者，从历史启蒙主义的视角出发，探索“西强中弱”的原因，他们把中国的战败归结为“器之落伍”、“技不如人”，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希望晚清政府进行政治改良，积极倡导知识分子“西学东渐”。

189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关键的一年。中日甲午海战，晚清政府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此次军败，无论是对士大夫阶层而言，还是对普通民众而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使晚清政府自诩“天朝大国”的美梦彻底破灭，更重要的是使一些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从战败的事实中痛定思痛，以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现代的价值；同时，他们认为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要学习西方列强的现代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

1905年，中国自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被全面废除，致使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要想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愿，知识分子只有去寻求新的道路。于是，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启蒙意识的激励下，知识分子纷纷留洋，“西学东渐”之气一时蔚然成风，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愿望”，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人数、规模，也一年胜似一年。

在中国近代早期，思想改良派在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积弱积贫”根源的同时，还没有触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变，只是企求通过对西方先进技能的学习和晚清政府政治的改良，来挽救亡国的危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机。中国早期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也只是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废除后，无奈之下才留洋，去寻求新的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道路的，即“实业救国”。从相关资料来看，晚清尤其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留洋就读期间选学的学科，均属于自然学科或与其相近的学科，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主将中，鲁迅、郭沫若学习医学，郁达夫学习经济学，周作人学习土木工程，胡适学习农学，洪深学习陶瓷，丁西林学习物理学，张资平学习地质学，成仿吾学习枪炮制造，郑振铎学习铁路管理，田汉学习海军，李金发学习雕刻，闻一多学习美术，徐志摩学习金融，欧阳予倩学习商学，等等。

但随着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频繁，近代文学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基于对民众力量的新认识，看到文学（文化）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宣传启蒙思想、揭露批判封建文化的巨大作用，提出借用文学（文化）的变革作为“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的最有效手段，从而发起文艺改良运动，引导民众重视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文化）形式和文艺思潮，启迪思想，探求新的救国之道。

同一时期，无论是派往欧美还是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同时，深感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滞碍，意识到要推进中国的新发展，就必须创建新的文化形式。并进一步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器之落伍”、“技不如人”，最关键的是国民精神的麻木，而要改变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就要对国民进行启蒙与拯救，找到桎梏民众精神的思想文化根源。由此，这些知识者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启迪下，开始对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审视与反思，并选择通过文艺创作、文化革新竖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以实现其启蒙和拯救民众的目标。对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初衷，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作了详尽的叙述，代表了这批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在这种状态下，早期的文学启蒙者从“实业救国”思想转为

“文艺启蒙”，最终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彻底决裂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抨击、颠覆，以期构建适应现代中国发展的新文化。正如学者司马长风所言，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①。

二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完整的体系建构和发展轨迹，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兼及道、墨、法等家文化相融合的文化体系，贯穿于中国古代从庙堂到民间各个阶层的意识之中，数千年来，一直构建和支撑着中国古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理念和芸芸民众的思维理念与精神信仰，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依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历经了坎坷、多难、反复的道路。1840年后，由于晚清政府政治腐败、文化落后，以及军事的溃败，一些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向世界，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化随着枪炮传入中国后，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审视，以构建起一种新的文化，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再度复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上承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并在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下，以决然决裂的态度彻底地反叛旧文化，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向中国传统文化发难，并表达了要创建“五四”新文化的强烈愿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反对封建守旧的传统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他们把反叛传统文化的矛头指向中国数千年来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正统理念和

^①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

文化秩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①。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通过以《新青年》、《新潮》等为代表的创办最早的新文化运动刊物，积极发表批判传统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的主张。对封建正统秩序的批判集中表现为对儒学的“三纲说”和家族宗法制度的批判。“三纲说”是封建制度赖以建立的精神支柱，家族宗法制度是封建专制得以实现的基础。对“三纲说”的批判主要体现为对“忠”、“孝”、“贞节”的抨击，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则体现为对“孝道”、“贞节”的责难，致使权威、神圣的传统文化秩序被彻底击碎，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五四”作家通过其具体的文学创作向民众进行展示和揭露，以实现其对民众启蒙与拯救的愿望的。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要请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帮助解决民族“劣根性”的“顽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是坚决的，陈独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耻，虽倾江汉不可洗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②如鲁迅在文学创作上，借狂人之口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就是“吃人”二字，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吃人”的“文明史”，而深受传统文化毒害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③，并开创了乡土文学这一文学形式，通过系列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对在封建文化秩序统治下的民族“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周作人在其文学作品《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中阐述了建设新文化（文学）的

①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③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观点，对传统文化作出了批判，对中国民众的“人性”进行了重新发现，等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发难的同时，也把西方启蒙运动后的社会、哲学理论大量地引进中国，成为攻击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弥尔的自由论、尼采的超人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刊物成为译介西方思潮的最重要的载体。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来说，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其态度是绝对的开放和宽容的，不仅仅是把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文化理念毫不客气地引进国门，同时，古代希腊、印度的优秀文化，苏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东欧、北欧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也被大量引进来。正如鲁迅所说，“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吸收”，也就是他一贯倡导的“拿来主义”。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引进和广泛传播下，中国原本以儒家道统、文统、学统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儒、道、释思想文化体系，转换为以西方个人本位的自由、民主、人道精神和重实证、重经验、重科学为主的理性精神。

三

在传统中国，儒家文化曾长期扮演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其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文化观，以及基层的宗法制度和上层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帝国制度，共同作为封建历史延续的思想保障，维持着封建历史的纲常秩序。

1895年以前，儒家原有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建构，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学为中心的人生观，维持着中国数千年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信仰和精神世界。但1895年后，近代启蒙先驱倡导的“西学东渐”和原有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使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冲击，从根基上动摇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建构。其表现为：西方的思想文化在中国的引进和传

播，致使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迅速崩溃；科举制度废除，“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彻底崩溃；辛亥革命后，大一统王朝帝国解体；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向纵深拓展，乡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解体，宗法家族制度趋于衰微。同时，西方思想文化虽得到大力倡导和传播，但传统的儒家文化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范式的转型还没有初步完成，致使文化转型时代的启蒙者和民众面临着严重而深刻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认同危机，士大夫和民众的思想信仰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和空虚。在这种状况下，“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在批判的激情过后，开始冷静地对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进行自我质疑。民众的思想信仰与文化认同的危机更加重了这一怀疑，从而，“五四”思想者重新回到现实，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任何一种文学、文化、文艺形式的发展，必须建基于传统之上，不可能离开传统的有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的、内涵博大精深的智慧体系，是一种“集好坏于一身，优缺点是很难绝然分割”^①的统一体。由此而言，传统文化是历史沿袭下来的一种人文社会范畴，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道、释等其他文化形态。“五四”时代的启蒙者似乎以为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抛弃，才可“全盘西化”地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如陈独秀曾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②

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西方文化的持续引入，一些思想者同时感到西方文化虽然被大量引介至中国，但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②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还需一个过程，并非所有外来思潮都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发生影响，东方和西方各有其文化、文明和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本来就是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即使那些适合中国时代、社会和新文学发展需要的思潮，也都要有一个“中国化”的变形，即本土化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传统的儒家文化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范式的转型还没有初步完成。在这种状况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旗手也开始重新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价值进行客观的重估、评价。周作人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定位在魏晋，胡适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一切，呼吁正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而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反叛走向主动认同与回归。但随后中国传统文化在走向现代的近百年历程中，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紧密交织与相互撞击中曲折、反复地前进。毫无疑问，在西方文化被盲目引进的同时，其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撞击，激励启蒙者回归传统，寻找新文化的源流土壤。

在新文化重新回归传统上，其实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的同时，已有胡适等一些人提出“保存国粹”，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相对抗，偏重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整理国故”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起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场学术运动。其倡导者遵循“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理路，主张立足于“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中西文明的结合点。在研究态度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反对盲目高谈所谓“保存国粹”。胡适阐释说：“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①“于‘国粹’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27～528页。

之外再顾到‘国渣’，同时也于‘国渣’中间整理出‘国粹’，这才是国故学的重要。”^①

曾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对道家、法家和佛教的某些思想予以肯定。陈独秀在激烈批判儒教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②。鲁迅虽终生反对封建文化秩序，但还是充分肯定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

四

就“五四”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到重新回归的历程而言，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叛”中含有更新、革命、创建新文化的意愿；“回归”中含有反思、整合、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意愿，但最终是为了超越，在批评与继承中创造文学、文化的新生命。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观上的“扬弃”，在汲取原有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接受新的文学理念，对传统文化、文艺思想进行“重新建构”，建设起新的、适应时代需求的新文化、新文艺，从而推动中国民族文化（文学）的新发展，开创和拓展新的领域。“反叛”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回归”则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理性建构——继承与创新。

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回归和重新审视，意味着“五四”新文化先驱要对中国原有的文化进行价值的再评估，对主宰中国民众数千年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解构与重构，要以新的思想文化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再认识，并且要拥有清晰的思维，梳理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就是能够支撑中华民

① 郭绍虞：《国学论文索引四编·序》，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版。

②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2页。

族繁衍数千年的优秀文化因子，在继承这些优秀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给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以创建新的思想文化形式。其实，“新”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文化、文学、文艺领域最为突出的主题词，并被当时的学者竞相使用，成为一时的新潮。正如李欧梵所言：“自晚清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思想（以区别于过去面向经典儒学的总倾向）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比喻意义上讲，都充满着‘新’的内容：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到具体表示‘五四’的新青年、新文化、新科学，‘新’这一形容词几乎伴随着所有的社会 and 知识界的运动，使中国摆脱昔日的桎梏，从而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①

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过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面旗帜，立下了伟大功劳。”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大解放，使“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是对民众的一次彻底的思想启蒙，为民众思想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真正唤醒了沉睡在“铁屋子”里备受传统糟粕思想毒害的麻木、愚昧的民众。正是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冲破了一切传统文化规范的束缚，按照“五四”时期大力倡导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标准，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估定，摒弃其封建性、愚昧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

“五四”一代之所以会如此激烈地反传统，与他们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有关。在“五四”启蒙者的心目中，现代与传统是截然对立的，因此要构建“五四”现代新文化就必须反对

^① 李欧梵：《寻求现代性》，载《文艺报》，1989年4月29日。

传统文化。其实，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发难的“五四”思想者们，实际上都继承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传统，也就是在这个高度上，他们才有资格批判旧文化，才有资格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但他们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为中国文化、制度的恶毒而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建设新文化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以传统颠覆者的姿态，借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使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也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思想文化秩序值得追求。

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中国并存新旧两种文化，新文化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是启蒙知识分子自觉倡导和大力传播的；旧文化即传统文化以其数千年来形成的惯性力量，保持着原有的本色，二者相互撞击、相互较量、相互渗透，构成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的独特风貌和奇异景观。

五

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社会生活进行及时、准确的反映，同时，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这个时代文化的如实反映，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学往往就是这个时代社会生活、人情文化的真实写照。从20世纪的文学创作来看，传统与现代紧紧交织在一起，共同建构着作家的创作理念。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及其影响下的一批乡土小说作家，在进行乡土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一直处在两种理念相撞击的矛盾中，他们一方面在现代文明意识的观照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的愚昧、麻木以及累累陋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示和剔挖，“揭其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的优秀因子，也